

470953

山西文史资料

第二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朱德同志在安泽四昼夜	邓辰西 (1)
优秀的青年指挥员——王靖烈士	吴林泉 (4)
回忆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十团	李思元 (40)
决死四纵队第十九团的一些情况	冀春光 (52)
工卫旅的医疗卫生工作	薛登歧 李万泉 (55)
战斗在晋察冀边区西线前哨	郭高岚 (69)
黄河两岸的地下斗争	黄石山 (88)
晋绥兵工发展简史	蒋崇璟 赵华清 董宁 (102)
回忆晋绥化学厂	冯 直 (110)
忆晋绥兵工部第五厂	段映奎 (116)
“鼎龙式五〇掷弹筒”和“向应式自动步枪” 的诞生	温承鼎 (125)
交城山里的修械队	赵涌泉 (133)
马林同志在敌人监狱中	高 波 (139)
狱中纪实	关中廷 (144)
艺术通讯社和西北剧社纪事	张季纯 (169)

读者·作者·编者

对高步青职务和高联魁姓名的订正	白钟昆 (109)
山西处死的另一名日本战犯为白岩政夫	白钟昆 (109)
对《六十一军在天镇盘山抗战纪实》的商榷	吴至诚 (185)
对《“一二·一八”惨案及洛阳请愿记略》的订正	戎子和 (186)

朱德同志在安泽四昼夜

邓辰西

一九三八年我在安泽县担任抗日政府县长（当时名为邓肇祥），亲自接待朱总司令在安泽度过四个昼夜，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现就回忆所及，简记如下。

大约是二月十四日午前，县政府的传达员向我报告，说门口有一位八路军的大干部要见县长，叫他进来传达。我想以前八路军过路干部到县政府，都是给传达室说一声就直接进来啦，为什么这次还要叫传达？根据传达员讲的面容，我分析可能是朱总司令，就急忙去门口迎接。果然是朱德同志来了。我高兴地说：“总司令直接进来就行了，就不需要传达了。”朱总笑着说：“你是县长，县政府不能随便进的，要经过你允许嘛！”说着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朱总告诉我，日军已到东阳关，临（汾）屯（留）公路可能很快有仗打。并说彭总已带一部分人到高平一带去了。朱总同左权参谋长、总政治部民运部黄镇部长等一部分人员暂住安泽城。我趁设营人员去安排住处的短暂时间，把安泽县的情况和工作向朱总做了扼要的汇报。快吃午饭时，设营人员报告住处已安排好，朱总没在县政府吃饭，就赶往住处去了。当天住在一个王家地主的院里。

下午，我请朱总给县牺盟会、公道团、宣传队、县政府人员及武装自卫队讲话。个别开明士绅也听了这次讲话。会址在文庙

背后的县政府会议室内。朱总主要讲了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抗战必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动员大家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会后我送朱总回驻地。朱总又对我做了一些指示，叫我立即从长期战争着眼安排工作，做好打游击的准备。并指示总部通讯连把他的电话和我的电话直接接通，以便有情况能随时联系。

当晚，我把电话放在枕边。凌晨一、两点钟，电话铃响了，是朱总亲自打来的。他说敌人已快到良马镇，叫我立即去他那里。

我赶到朱总驻地，朱总告诉我，我军可能在府城东边的地方打阻击战，以掩护临汾抗日军民安全转移。他说：“不过我的部队不多，需要把你的自卫队带去。”（阻击战实际是在府城东边的三不管岭和府城西旁的草峪岭打的）并说他立即动身去古县镇，叫我回去把工作布置一下，立即带上县自卫队在拂晓前到古县同他汇合。

我回到县政府连夜召集牺盟会、公道团的干部和县政府科、局长开紧急会议，安排了工作，并对县自卫队作了简短动员，就率领部队出发了。

我们在拂晓前到达古县镇。朱德同志说：“这次阻击战由左权参谋长指挥，前线由警卫团王团长指挥（总部警卫团实际上只有一个连），你把县区自卫队交王团长指挥。”并请来左权参谋长当面作了安排。随后朱总给了我一个任务，叫我守着一个电话机，专门同驻在临汾的阎锡山、卫立煌联系，并向他们说明我的身份，通报敌情、战况，请他们赶快派出支援部队。

我按照朱总的指示，一天几次给阎锡山、卫立煌打电话联系。每次他们都答复立即派部队来，或已派部队走了，有时还说某部某部几时几分可到达某地。这样的电话我打了两昼夜，但未见他们派来一兵一卒。朱德同志指示我，不管他们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你隔一阵子就给他们打一次电话，向他们要兵。到第

三天，对方连接电话的人也没有了。直到敌人的炮弹打到古县镇里时，朱总断定临汾的人已安全转移完毕，才决定撤退转移（阎、卫转移完毕也没告诉朱德同志一声）。临行前朱德同志告诉我，北线之敌已快到洪洞，临汾可能在一、两天内失陷，这样安泽就成为敌之侧后方了。指示我回去后抓紧发展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他准备经过安泽南边转移到屯留县良马镇暂驻，并将不断派人和我联系。

我率领前线撤下来的自卫队回到安泽后，即按照朱德同志的指示，将工作转入战时状态。二月底，朱总派总部联络参谋覃应机到安泽和我联系。此后，覃应机同志每隔二、三十天就到安泽联系一次。

朱德同志在安泽的时间不到四个昼夜，行军一百多里，打了两个多昼夜的仗，对地方干部讲了话，对地方工作再三做了指示。他的这种不顾疲劳的革命精神，尊重地方政府、关心地方工作的良好作风，对同志谦虚和蔼的态度，使安泽的干部、旧政府官员、开明士绅和当地人民都深受感动。如旧政府的一些官员说：

“这样的军队没见过，这样的总司令更没见过。有这样的军队打日本一定能胜利。”他们还说：“朱德这个名字真是名副其实呀！”过后好久，大家还一直议论着，以能亲眼见到共产党最高级领导人、八路军总司令为莫大光荣，以能亲耳聆听朱总的讲话为莫大幸福。朱德同志在安泽短暂的时间，扩大了党的影响，提高了党的威信，传播了革命思想，给我们的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彙編整理）

编者附注：本刊十三辑曾发表过《朱总司令在安泽》一文，请读者参阅。

（本文作者现任山西财经学院党委书记、省政协委员）

优秀的青年指挥员——王墉烈士

吴林泉



1946年5月，任五分区司令员在闻喜县照的，时年三十一岁

王墉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转战于太岳山区。一九四八年三月在解放临汾的战役中壮烈牺牲。牺牲前担任八纵队二十四旅旅长，年仅三十三岁。王墉同志作战机智勇敢，身先士卒，屡建奇功，不愧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名优秀指挥员。他的一生是英雄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从东北到关内

王墉同志，一九一五年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城内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第六。因家境穷苦，父母养活不起，三岁时过继给叔父为子，被叔父挑在筐内闯关东，来到黑龙江省拜泉县，在沃野千里的黑土平原，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十三岁在拜泉县读完小学，以优异成绩考入哈尔滨市立第三中学。第一次大革命的兴起和失败，使他开始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一九三一年他初中毕业后又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扶轮高中。

好学上进的王墉，每天做完功课，便急忙奔往学校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课外读物，不断地开拓自己的视野。那时他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热望将来做一名科学家，造福国

家和人类。一九三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侵略者的炮弹，炸毁了他可爱的家乡，改变了他人生的道路。热血沸腾的王墉和同学们奔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并且投笔从戎，参加了马占山的抗日部队，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浴血奋战。

孤立无援的马占山部队，在转战几个月后，在黑龙江省无法存在下去了。热爱家乡的王墉，离开部队，又回到了拜泉县。但家乡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占领了拜泉县的日本人和汉奸，以他是抗日分子，到处搜捕他；他的叔父母也遭到了日军的杀害。于是十六岁的王墉被迫离开了家乡，跑到关内，开始了流亡生活。

在流亡中走向革命

王墉在关内，举目无亲，无家无业。他到天津打小工，当报童；到济南“救国小报”做校对，当编辑，在北平海淀区做挤羊奶工人。在饥饿袭击时，他不得不在垃圾堆上与狗争食。

敌人的屠杀，生活的鞭挞，砥砺了他战斗的勇气和韧性，促使他和革命的志士走到一条道路上。在平津，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东北青年救亡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他还参加了北平的“新文字会”、“救灾会”、“社联”、“北平学联”、“民先队”等一些由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在进步同学的帮助下，他顶替袁伟信的名字，先到北京东北大学，后又到华北大学学土木工程，一边勤工俭学，一边担任平津学联的地下交通，并负责出版学联的机关报。一九三六年四月，经燕京大学王汝梅和韩天石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战斗在前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带着家仇国恨的王墉，表现得分外勇敢，总是战斗在前。“一二·九”北平学生举行游行示威那天，他负责纠察队，在队伍的前后奔来跑去，保护同学们的安全，保持游

行队伍的严整。当反动军警用大刀、水龙镇压冲击游行队伍时，他挺身而出，站在最前面，英勇搏斗，夺取军警手中的水龙，在凛冽的朔风中，衣服都结了冰。为了壮大抗日救亡战线，一九三六年一月，他响应北平学联号召，不畏蒋介石的残酷镇压，不顾个人的安危，积极参加南下宣传团，跑到南京、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六年三月间，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关进国民党监狱的河北十七中郭清同学，被拷打折磨死了。消息传出后，激起北平市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慨，北平学联决定在三月三十一日，举行抬棺游行，揭露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镇压学生的反动嘴脸。王墉立即响应学联号召，把自己做小工卖苦力的钱，捐献出来买棺材。在“三·三一”游行那天，他抬着棺材走在最前面。在南池子，游行队伍又遇到了国民党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王墉勇搏在前，被打得满身是伤，但他毫不退缩，坚持战斗到最后。

犯了抗日救国罪

王墉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引起了敌人的仇视和注意。那时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下，抗日犯禁，爱国有罪。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深夜，他遭到了国民党北平警察局的逮捕，被戴着镣铐关押到北平公安局，后又解押到北平绥靖公署看守所。不久便染上了伤寒症，每天高烧达四十度，濒临于死亡线上。经过难友们对反动当局的强烈抗议，敌人被迫将他送进北平陆军医院就医。在那里，他得到了医生护士们的好心治疗和护理，生命得到了挽救。病愈后，伤寒症使他脱光了头发，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袁小秃”。此时敌人又将他转到北平反省院。在这里，他遇到了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他们高深的理论修养，钢铁般的革命意志，卓越的斗争艺术和阶级友爱，深深地教

育了他。尽管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威胁利诱，王墉同志始终英勇斗争，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和纪律。在党组织的营救下，这年十一月四日，王墉同志出狱。一九三七年一月，他原打算去延安，路经山西太原，因与薄一波同志相识，遂留太原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工作。从此开始了新的战斗。

参加人民军队

王墉被分配到牺盟总会学生工作部工作。他和纪毓秀等同志在一起，进出太原各大中学校，向学生宣传牺牲救国同盟会抗日救亡的宗旨，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在师生中发展牺盟会员，组织歌咏队、演剧队，发动学生上街下乡，演街头剧，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一九三七年六月，他们组织太原市学生，到太谷县岚村一带野营，进行军训，学习游击战术。王墉每天五点半起床，和学生们一起出操爬山，进行制式教练，学习军事技术战术。他还经常深入到学生中，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做思想动员工作，活跃异常，深得学生们的爱戴。在这段时间里，王墉像闪烁的火种，到处点燃人们抗日革命的火花。

“七·七”事变发生后，王墉和野营的同学返回太原，立即响应党的号召，带头报名到抗日前线去，并组织了十三勇士团，由他负责带队。在太原市南门外火车站，牺盟会召开了数万人的欢送十三勇士奔赴抗日前线大会。王墉高举着“打回老家去”的旗帜，站在火车头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

王墉带领十三勇士到了平津前线，参加了东北军五十三军万福林部队，意欲推动该部走坚决抗日的道路。但是，由于该部是未经改造的旧军队，从军内制度、官兵关系到战略战术，仍然是旧军队的一套，经不住日军的进攻，一直沿着平汉路，向石家庄以南溃退。王墉深感依靠这些军队，是难以坚持抗日战争到胜利

的。三个月后，他便离开了该部，又回到山西，在祁县子洪口找到薄一波同志，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从此，王墉同志投入了伟大的人民军队的战斗行列。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日本侵略者攻占了太原，王墉跟随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决死队第一纵队，南下晋东南，创建了太岳抗日根据地，开始作地方武装工作，担任过沁源县公安局长、沁县公安局长、游击十五支队支队长、营长。从一九三九年起，又担任过决死一纵队政治部组织干事、纵队司令部侦察科长，一九四〇年十月，调任二一二旅五十五团团长。一九四二年四月，根据党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二一二旅进行整编，将五十四、五十五和五十六三个团，合并缩编成一个团，保留五十四团的番号，王墉改任五十四团团长，隶属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指挥。一九四五年二月，为了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根据太岳区党委决定，王墉同志带领五十四团，参加了开辟中条山和汾南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建立了太岳军区第五军分区（后改为三分区），王墉先后被任命为五分区的副司令员和司令员。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地方武装纷纷被改编为野战部队，王墉又被任命为八纵队二十四旅旅长。

英 雄 的 性 格

王墉同志是在党的长期教育培养下，在抗日和革命的烈火中，久经锤炼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青年指挥员。他对党对中国人民无限忠诚，有着高度的革命觉悟和责任感。他在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但是当中国革命需要进行武装革命时，他立即投笔从戎，把武装革命选作自己最热爱的工作。他对同志们说，他的最大乐趣，就是为革命在战场上与敌拼搏，消灭敌人。他英勇善战，机智灵活，身先士卒，视死如归；他豁达乐观，藐视困难，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爱护人民，

关心战士。他能双手写字，写得一样好，他能两手打枪，打得都很准。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他只要能听过或读过数遍，就可以准确地背诵。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只要反映到他视线内的有利战机，他是绝不会放过的。在优势敌人面前和情况危急时，他总是镇静自若，没有丝毫的慌张。而且情况越是危急，他越是沉着冷静，战士们只要看一眼他那极端沉着的必胜脸色，便立刻勇气百倍。因此，在无数次危急的战斗中，他总是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作为军事指挥员，这些优秀的品质和风格，赢得了战士们的信赖，大家最愿意跟他去打仗。

在十年频繁的战火中，他多次挂花负伤，满身伤疤累累。他的传奇般的英雄故事，在太岳山区有口皆碑，传颂不绝。

捷 报 频 传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份，王壩任五十五团团长不久，日军对太岳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所到之处，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十一月二十二日，王壩奉命率领全团在白虎窑阻击敌人，掩护纵队机关和根据地腹心地区群众的转移，与敌二四四联队，激战了五个多小时，使敌人难越雷池一步。任务完成后，王壩率领全团，跳出敌人的合围圈，钻进敌人空虚的后方，连续打了几个漂亮的歼灭战。

王壩带部队到达赵县的石门峪村时，刚一住下，便接到群众送来的情报，说有个名义是阎锡山委派的、实际上完全听日军指挥的洪洞汉奸县长，带了一个保安大队，配合日军对根据地扫荡以后，驻扎在杨家掌村，继续烧杀抢掠，强奸妇女，为虎作伥，无恶不作，群众痛恨之极。这股敌人虽然骄横，但却装备不良，战斗力不强，而且在日军的羽翼下，警戒不严。王壩决定在农历除夕晚上，实行远距离奔袭，消灭这股敌人。一九四一年一月二

十八日，他带着部队，穿过敌人三道封锁线，急行军九十多里，于凌晨三点来到杨家掌村外。敌人果然麻痹异常，村外连个像样的警戒都没有。二连担任突击队，其它各连按照战斗部署，仅经一小时的战斗，将包了许多饺子、准备拂晓迎神的敌人，全部歼灭，击毙敌大队长李谊轩以下十六人，生俘八十余人，我无一伤亡，为杨家掌一带老百姓除了大害。创造了远距离奔袭，全歼敌人，我无伤亡的模范战例。

不久，新华社又连续播发了王墉部巧夺敌人据点的胜利消息：

二月的一天中午，王墉化装成农民，夹在给敌人送粮的群众里面，进了霍县辛置火车站，对车站的地形，敌人的碉堡，守备的兵力火器配置，以及进出路线，进行了详细的侦察。回来后立即对参战部队进行了临战训练。在他精明严谨的指挥下，二月十五日夜，七连一排和团部侦察班，对敌人进行了奇袭。七连一排长黄保元带着他的一排战士，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敌人碉堡。当巡逻的老百姓向日军报告“平安无事”的时候，黄保元将手榴弹顺着敌人的烟筒，接二连三地丢进了敌人的“乌龟壳”，消灭了日军一个小队，一班伪军全部投降，解放了辛置车站，我军无一伤亡。

日军立即调兵遣将，加强灵石、霍县沿线的防守。机动灵活的王墉却带兵南下，在洪洞、赵县之间的铁路线上，挖路基，翻铁轨，割电线，炸列车，围困据点，进行政治攻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交通破击战。当被搞得晕头转向的敌人，仓皇抢修铁路时，王墉又指挥侦察班长赵玉书，带着一班战士，在地下工作同志的配合下，解放了二十里铺火车站，将守敌全部消灭，夺回了被敌人抢去的粮食和大批军用物资。

卓越的指挥艺术

一九四一年一月，与王墉率领五十五团在同蒲铁路连传捷报

的同时，驻守岳南和中条山地区几十万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部队，在日军的进攻下，兵败将逃，丧师失地，使岳南和中条山的广阔国土，沦陷敌手，数十万人民被践踏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

为了拯救人民于水火，一九四一年五月，二一二旅奉命开辟岳南抗日根据地。五十五团从赵县出发，作为旅的先头部队，越过临屯公路，向岳南的沁水、翼城、浮山、临汾等地挺进。在安泽段峪村和界牌岭，接连歼灭了日伪的堵击部队，粉碎了日军在岳南刚刚建立起的残暴脆弱的统治。岳南各县人民踊跃奋起，迅速地建立起了抗日政权。

一九四一年八月，阎锡山命令六十一军军长吕瑞英，带着四十八师和六十九师六千多人，在日军据守的汾城史村桥上，东渡汾河，向我新开辟的岳南抗日根据地，大肆进犯。占领了我临汾、浮山、曲沃、襄陵、翼城广大地区。还气势汹汹地向我浮南之西马、河潞、赵城村等地深入。杀害了我派往该部联络的郑乃端、赵福生、张海青、段新阶、张子善等同志。八月七日，敌人二〇五、二〇六、二〇七、二〇八等四个团，向我秦家圪塔、杨家河、西城的阵地猛攻。我二一二旅之五十四、五十五和五十六团，坚守阵地两昼夜，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进攻，敌人死伤惨重，未能得逞。八月九日，兄弟部队三八六旅赶来支援。两旅首长决定，给进犯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

按照战斗部署，由王壩率领全团，从敌人两个部队的结合部穿越过去，插进敌人的心脏，采用猛虎掏心战术，奇袭敌人的主阵地赵城村，消灭敌人的指挥部和炮兵阵地，打乱敌人的指挥系统，给兄弟部队创造分割围歼敌人的有利条件。五十五团的任务，是整个战役关键的一着棋。现在，不是一个班或一个排去偷袭敌人（这是比较容易作到的），而是一个团的部队，七、八百人，穿过敌人设防严紧的阵地，在眼睛瞪的像铜铃似的敌人鼻

子下面走过去，插向敌人的心脏。可以设想，在穿插的过程中，只要有一个粗心大意的战士暴露了目标，就会给全团、给整个战役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这个任务的艰巨，王壙是深为了然的，但他却因为旅首长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自己，而感到莫大的高兴。

王壙回到部队后，以非凡的努力进行备战工作。从对敌人的侦察到部队的临战训练，从思想动员到后勤保证，从部署区分各连队的战斗任务到对每个战士进行夜间偷袭时的着装、要求，都进行了极其严格细致的工作。临出发前，他和政治部主任邵泽民一起同各连的干部，对每个战士携带的武器弹药、搪瓷碗、水壶、干粮袋、挎包，逐个检查。要求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发出一点响声，路上严禁吸烟、咳嗽和说话。

十一日天黑后，部队出发，王壙紧跟在担任突击任务六连的后面，指挥七百多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在漆黑的沟谷和崎岖坎坷的小道上，悄然地疾速行进。在穿过敌人结合部时，能听到敌人换岗说话的声音。但这七百多个勇士却寂无声息，硬是从敌人的眼皮和鼻子下面走了过去，从赵城村西南面的深沟里、敌人的侧后方摸了上去。

六连突击排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消灭了敌人的班哨。接着各连以猛虎下山之势，消灭了敌人的指挥机关，攻占了敌炮兵阵地。敌炮连一百多人还没有弄清情况，便胡里胡涂地当了俘虏。两门发着蓝光的崭新的迫击炮，完美无缺，成了五十五团的战利品。在没有惊动四周敌人的情况下，敌人的核心阵地就被王壙指挥的五十五团攻占了。这真是卓越的指挥艺术。

拂晓，各个部队向敌人发起了总攻，各处阵地的敌人纷纷来电话，要求炮兵支援。王壙命令新获解放的炮手，架起大炮，向着西马、河嘴各村敌人的阵地，开炮猛轰。开始，敌人的指挥官暴跳如雷，骂师部的炮兵瞎了眼，竟然向自己的人开炮，继而迷惑不

解，终而惊慌失措。我军各部看到从敌人心脏里发射的炮弹，纷纷落在敌人的阵地上开花，全线欢声雷动，奋起冲击。敌人在我铁拳打击下，迅速地垮了下来，向司空山方向败退。我早已埋伏在那里的五十四团和五十六团，截住敌人的去路，迎头痛击。王墉指挥五十五团的勇士们，跟踪追击，把溃逃的敌人，压在滑家河的大沟里，前后夹击，两千多敌人纷纷缴枪投降，敌二〇七团团长和二〇八团团长高桥、李锡谦，也顺从地交出了上司授予他的“成仁”短剑。这次战斗的胜利，得到太岳纵队首长的表扬，说他们“创造了新军歼敌的新纪录”！

“这仗打得多漂亮！”人们都兴高采烈，公认王墉和他指挥的五十五团，对于这次战斗贡献最大。但王墉却对自己很不满意。因为在战斗中，由于通讯联络计划不周密，最勇敢、屡建奇功的战斗英雄赵玉书，在夺取敌人阵地时，与友邻部队发生了误会，不幸牺牲了。王墉像挖掉了自己的心头肉一样，心痛异常。在战斗总结时，他向全团战士沉痛地作了检讨。王墉同志这种胜而不骄，永远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使战士深受教育。

插向敌人心脏的尖刀

灵活机动，英勇顽强，是王墉和他所带的部队战斗作风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太岳纵队在几次大的战役中，总是把王墉部当作一把锋利无比的尖刀，刺向敌人的心脏。

一九四四年一月间，阎锡山不甘心抗日军民的胜利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他经过密谋策划，进一步和日本侵略者勾结起来。元月二十六日，又派他的高级军官杨澄源（汾东领导小组组长）和六十一军军长梁培璜，带着三个师和九个保安团数万人马，第三次东渡汾河，向太岳抗日根据地大举进犯，扬言要“开展汾东，收复失地”，要“通过巩固战略据点，建立战术据点”，实现他制定的“自固与开展”的战略。

为了打击反共顽固派的反动气焰，新军决定进行第三次临浮战役。战役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摆在最前面的敌人的主力七十二师。这个师，敌人吹嘘是经过阎锡山亲自设计的“烘炉训练”，号称“铁军”。第二阶段，乘胜消灭敌人六十一军军部及其四十八师和六十九师，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战役指挥部没有让王墉和五十四团参加正面作战，而是给了他们一个特殊的任务。命令他们深入敌后，到塔儿山地区独立作战。威胁敌人的首脑机关，消灭敌人的后方部队，截断敌人的补给线，阻击敌人从汾河西岸来的增援部队。

九月八日黄昏，王墉团长和金世柏政委带着部队，从秦家圪塔出发，穿过敌人重重叠叠的阵地和封锁，一夜急行军一百多里，次日凌晨，来到塔儿山地区。在疾行中，首先攻占了塔儿山南麓的荞麦岭和马尾山，一举歼灭了这两处的敌人和敌人的粮秣补给站，生俘敌二百多人，缴获粮食五万多斤，骡马七十多匹。随即又全歼了驻守在龙王庙敌人的两个连。在龙王庙站住了脚跟。黎明时，敌人七个保安团七千多人，蜂涌而来。而对着十倍于己的敌人，王墉指挥五十四团，奋勇迎战，歼灭了敌人一个团，击溃了其余的敌人。使后方空虚的敌人，一片惊慌混乱。保证正面攻击敌人的部队圆满地完成了全歼敌人主力七十二师的计划。胜利结束了战役第一阶段。

龙王庙战斗胜利后，王墉得到了阎锡山又派十九军东渡汾河来增援的情报，其三十七师已到达塔儿山北麓之阎村和槐堰村。王墉决定乘敌人经过长途行军立足未稳之际，打击敌人。他带领部队连夜撤离龙王庙，奔袭阎村。在阎村干净利落地消灭了敌人十九军三十七师二团的先头营和一个机炮连，除毙伤敌人外，生俘敌二百多人，缴获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出色地完成了在敌后独立作战的任务。

游击战的能手

处在抗日反顽最前线的二一二旅各部队，战斗分外艰苦频繁，战斗减员不断增多，每个连队只剩六、七十名战斗员。一九四二年四月，为了施行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减轻根据地人民负担，充实加强连队，领导决定将二一二旅的三个团，合并缩编成一个丙种团，保留五十四团的番号，下辖四个连和一个精干的团指挥机构。深孚众望的王塘，改任五十四团团长。更重大更艰苦的战斗任务，落在了他的肩上。

一九四二年，日本侵略军对我根据地实行围攻、扫荡、蚕食，对其占领区则实行“强化治安”，使我抗日根据地缩小了，部队的人员减少了。岳南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处于异常困难的情况下。部队既要粉碎敌人的围攻扫荡，保卫根据地人民，又要开荒种地，养猪种菜，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王塘和金世柏带领五十四团的健儿，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迎接着这一严峻的考验。一九四三年，一位新华社的随军记者，统计他们的战绩说：“开辟岳南抗日根据地两年多来，平均你们每天行军六十里，三天要打一次仗，真是了不起的游击战的能手啊！”

这一年，王塘带着部队，两次钻进日军碉堡林立的格子网里，彻底消灭了伪军侯镜伯的部队，为冀城人民除了一大害。七月中，他配合兄弟部队，在大雨滂沱中，钻进曲沃县敌人的格子网中间，全歼了汉奸伪军保九团，活捉了团长武宏英，为曲沃县人民除了一大害。九月二十七日，王塘率领一连，抓住日军主力深入根据地扫荡、后方空虚的机会，在内线配合下，出奇制胜地打进了浮山县城，捣毁“乌龟壳”，生俘伪军六十多人。使扫荡的敌人首尾难顾，仓皇回奔。

日军为消灭岳南根据地抗日军民，进而采取了所谓的“囚笼政策”。一面在临屯公路上的良马、府城和曲高公路上增设据点，